

兩年來美國的反戰風暴

(中)

顏 黎



三、弗爾布萊特首先樹立反戰旗幟

當時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共有委員十七人，計民主黨十二，共和黨七。

這個於一八一六年開始設置而今天被美國新聞界稱之為反戰運動的「溫床」的外交委員會，自一九五九年即由弗爾布萊特擔任主席。弗為牛津出身之學人，從政前曾任堪薩斯州立大學校

長多年，在學術界原頗著聲望。但是他的政見，往往與本黨主政者背道而馳。一九四六年美國「中期選舉」，民主黨敗北，國會轉由共和黨控制，弗氏要求杜魯門總統辭職，主張以當時之國務卿代行總統職權，杜魯門老羞成怒，曾公開指稱弗氏為「半光明參議員」(Senator Halfbright 弗之姓氏意義為「全光明」)。弗氏與詹森總統之決裂，始於一九六五年四月初間，當時詹森在霍布金斯大學首次發表其對越政策一篇重要的演說，弗氏了然於其進行越戰以抵抗共黨侵略的決心，因向詹森提出一篇冗長的備忘錄，進行「諷諫」，未獲重視，懷怨在心，隨即作連續性之演講，題為「致命的權力驕橫」，(The Fatal Arrogance of power) 他說：「一個國家外交政策錯誤的改正，深有利於國內適時的批判……要言之，批判不止是一種權利，而且是一個愛國的行動——一個愛國的最高形式」。這種言論的發表，就是他樹立反戰旗幟的先聲。一九六六年

二月四日起，弗氏主持外交委員會對越政策公聽，三月更進而舉行對中國問題公聽，邀請發表政策性演講人，十九為主張與共黨妥協之所謂專家學者。由於此一公聽會之舉行，全美各界終於掀起對華政策之激烈檢討與辯論，導致「中共遊說運動」(Red China Lobby) 之復活，承認中共偽政權之呼聲頓起。而弗氏利用外委會傳播其個人政見，藉以改變美國對亞洲整個政策之企圖，至此昭然若揭。在參議院塞爾蒙、陶爾及墨斐等議員看來，弗氏難辭「叛逆之罪」，其心可誅；而民主黨議員史坦尼斯(John Stennis)、魯塞爾(Richard Russell) 及共和黨領袖克遜等，亦從此對弗冷若冰霜，敬鬼神而遠之。弗爾布萊特為此會向人埋怨地說：「如果是在希特勒的德國，我早已被殺了；但在詹森的美國，我只不過是受到排斥而已」。 (In Hitler's Germany, I'd have been killed. In John-son's America, I am only ostracized.)

弗氏領導反戰，其最傷詹森總統之心而影響最惡劣者，莫過於進行取銷國會通過之「東京灣決議」(Tonkin Bay Resolution)之企圖。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及四日，美國第七艦隊所屬之「麥達克斯」(Maddox)及「藤勒卓」(Turner Joy)兩艦航行於東京灣公海之上，先後遭受北越砲艇無理攻擊，第二次攻擊後八個半小時，白宮決定採取報復行動，命令美機轟炸北越，並同時向國會提出其「東京灣決議」，請求國會授權，以便應付越南之緊急情況。國會參家兩院於八月七日以五〇四票對兩票，通過該一決議，授權總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擊退任何對美軍之武裝攻擊，及防止進一步的侵略……」

(……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repel any armed attack against the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prevent further aggression……)這是詹森總統此後在應付越戰中自由採取軍事行動的最大法律依據，也是整個越戰擴大的一個轉捩關節所在。

但自前年八月起，反戰運動進入高潮，弗爾布萊特及摩爾斯等即在外交委員一再興風作浪，企圖撤銷「東京灣決議」，弗氏說：「我們足足花了一點四十分鐘去考慮那個決議，真是一個災難，一個悲慘的錯誤。」然而他這種說法，並不能激起國會的大眾同情與支持，理由很簡單，如果國會取銷「東京灣決議」，那不僅是否定自己的總統，認許敵人的侵略，而且無異是向敵人豎起一面白旗。

可是弗爾布萊特並不因此罷休。一九六七年

十二月廿一日，外委會公布一九六六年九月廿日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彭岱(William Bundy)在該會秘密會上的證詞，認為一個類似於「東京灣決議」的全文，早已於東京灣事件發生前由國務院擬好，顯示當局有意擴大越戰之預定企圖，而在八月四日美艦遭受攻擊後不過十一小時，美機已在北越領空執行轟炸任務，白宮當時是否取得北越砲艇攻擊之確切證據，大有問題。當去年二月廿一日國防部長麥克麥拉(Robert McNamara)在外委會作證，提供美艦遭受攻擊之具體證明之後，弗氏竟公開指摘麥氏的證詞，是「一個做事的一面之說，我相信這欺騙了美國大眾。」(only one-side of the story... This, I believe, deceives the American public.)當去年三月十二日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在外委會作證時，摩爾斯議員更極盡攻擊之能事，他說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及四日美艦在東京灣海面「並非作例行性巡邏，而是作挑釁巡邏……那是毫無疑問，而歷史將會如此記載。我們是一個挑釁者。」(not on a routine patrol but on a provocateur patrol...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question and history will so show. We were a provocateur.)魯斯克國務卿為避免激起民間反戰情緒之高漲，予敵人以可乘之機，兩年來一直婉拒外交委員之要求，前往作證。但為大勢所迫，終不得不於去年三月十二日前往備詢，繼續兩天之久。這可以說是他就任國務卿七年多來的一次嚴重考驗，在死硬「主和派」控制下的外委

會，質詢變成訊問，批評變成攻擊，虎視眈眈，如臨「大敵」。然魯斯克為牛津出身之名學者，終能憑其豐富之經驗，高度之智慧，及其雄辯之天才，為美國遠東政策作了一次歷史性的傑出的辯說，即使是反對他的人，亦無不為之暗中折服，人民為着他這次偉大表現而同聲讚美，兩天之內，支持他的函電達五千份之多，詹森總統在白宮電視中看到這位忍辱負重的國務卿為歷史真理滔滔雄辯的情形，除了予以最高讚揚外，對於他的飽受委屈，感同身受，詹森發表談話說：「我們的許多弱點是在於我們的力量彼此相闕和自相咀嚙」(A great deal of our weakness comes from pitting our strength against each other and chewing on ourselves)，這真是一語中的沉痛之辭。

四、「和平候選人」麥卡錫和麥克構芬

這位於五十四年前出生於明尼蘇達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而今天成為名噪一時的「和平候選人」麥卡錫(Eugene Mc Carthy)，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是一個史蒂文生式的自由派書生，但他遠不如史蒂文生的偉大。他在一九五二年當選為國會眾議員前，曾任大學教職多年，主講社會及經濟學科。一九五九年當選為參議員後，他注意的問題，由農業稅務轉向國際關係，但他進入國會十六年來，從沒有研究提出過任何一個重要法案。他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原亦無任何顯著的政治立場，一直到前年八月，他才正式揭出

反戰的面目。當十月十二日國務卿魯斯克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到「在未來的十二或廿四年之間，中國大陸將有十億人口；他們裝備着原子武器，但對亞洲其他地區的態度如何，甚難肯定」一段話時，麥卡錫首先起而攻擊，誣控魯斯克企圖以中共力量之威脅，作為支持詹森總統亞洲政策之托辭，而享譽全美之自由派專欄作家如勒斯通 (James Reston—紐約時報執行編輯，即高於總編輯職位) 等，更於全國數十家重要報紙撰寫文附和，因此，這個於本世紀初年由德國帝王威廉姆第二 (Kaiser Wilhelm II, 一八五九—一九四一) 首先喊出的所謂「黃禍」(Yellow Peril)，遂在美國再度活現「幽靈」。十天之後，麥卡錫在拍克萊加州大學演講，竟要求國務卿魯斯克辭職，他說如果魯不辭職，「民主黨重要人士應準備支持那些願意高舉反對現任總統的旗幟的人」，這是他準備以反戰為號召，參加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先聲。

但是麥卡錫既未具備總統的才能，在國會又無任何成績表現，因此當他前年冬正式宣佈競選時，誰都不予重視，即使是國會參眾兩院三百位民主黨同僚，除了加州的一位眾議員外，竟無任何人出而支持。然而時勢造英雄，越戰的惡化，終為麥卡錫帶來了新的力量與希望。當去年二月二日越共發動全面性瘋狂突襲之後，美國反戰風暴，席捲全國，動搖份子認為這是對越政策的最後「破產」，支持麥氏是他們最好的「出路」，而左派知識青年，一時風起雲湧，為麥「助陣」，四週之內，東部各重要大學學生自動前往參加

助選工作者，數達五千人，紐漢普夏州 (New Hampshire—為兩黨舉行初選的第一個州) 共有民主黨員八萬二千零十六人，這批學生為麥爭取選票，挨家拜訪，竟達六萬次之多，由此可見他們奔走效命之勤。當三月十二日初選投票之先，歷次民意測驗顯示，麥可能獲得票數為百分之十至十一，最高亦不超過百分之二十，誰料是日選舉結果，麥克獲得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一票，僅少於詹森總統所得票數二百三十張 (筆者註：現任總統並不直接參加州內初選活動，而係由黨內選民自動選舉)，全國為之駭然，而麥卡錫遂從此身價百倍，成為全國反戰青年學生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麥卡錫畢竟不過只是一個妥協派的象徵而已，他的言論失當，尤招致大眾之不滿，如在巴黎和談進行之際，他竟宣佈要前往巴黎會晤北越代表；當公佈他的所謂「當選」總統後的「內閣」名單時，他竟預定一個黑人主婦 (被刺黑人領袖金恩之妻) 作為駐聯合國大使；尤其是當去歲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公然罔顧人道法律，派遣二十萬大軍佔領捷克之後，人神共憤，即國際共產黨徒，亦互相指控，而麥卡錫不僅無動於衷，反而發表言論，批評詹森總統「小題大作」，不應提請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甚至將俄國派兵佔領捷克與美軍援越混為一談，其言論之荒謬，一至於此，即使一向衷心支持他的反戰領袖人物，亦為長知所驅使，出而指摘糾正。由此可知，麥卡錫要想當選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迷夢，已是永無實現之一日了。

麥克構芬 (George Mc Govern) 和麥卡錫的出身與政見，相似之處甚多。他們同是由大學教授而競選進入國會的議員，對於越南政策，他們同是主張無條件完全停止對北越轟炸，實行停火，南越組織聯合政府，美軍迅速撤退，而麥克構芬更主張立刻將駐越美軍減少至二十五萬人。

這位現年四十七歲的「和平候選人」，原是對中共政權抱有最大錯覺的。多年前他就公開表示，毛澤東的游擊隊伍只是一個「以排除外力控制，改進人民生活為目的的革命武力」(revolutionary forces aimed at throwing off outside control and securing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當一九六六年三月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掀起中國問題的風波之後，麥克構芬在一次政策性演說中，不僅呼籲承認中共偽政權，而且認為中共有權攻擊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力量，和在亞洲「建立一個門羅主義……和我們為自己在西半球所宣佈的一樣。」(establish a Monroe Doctrine...which we proclaimed for ourselv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在另一次聲明中，他說：「對於他們(指中共)從事組織發展他們廣大的國家和克服其困擾問題的努力，我們希望他們繼續進步。」(We could wish them continued progress in their efforts to organize and develop their vast country and conquer its staggering problems)，其言論之荒謬，莫此為甚。一九六六年六月廿八日，國會眾議員艾希布

魯克 (John Ashbrook) 曾以「中共遊說」(The Red China Lobby) 為題，在眾議院發表演說，指出美國當時姑息與妥協運動之內幕，對麥克構芬之荒謬言論，曾特別予以駁斥，他說：「我是不會希望一個迫害、屠殺、和奴役專制統治下的政權繼續進步的」(…I am not about to wish continued progress to a regime that persecutes, executes, and enslaves the people under its tyrannical rule)，其痛憤之情，溢於言表。

麥克構芬之所以遲遲宣佈競選，其目的在爭取已故羅伯甘迺迪派之實力，作為其參加民主黨大會的政治資本，然其號召力量，猶遠不及麥卡錫。

五、羅伯甘迺迪是反戰反詹森的實力

派領袖

自一九六〇年起，「甘迺迪」三字在美國已成為一個神奇的名字。這不僅是由於甘家擁有億萬家財(光是由甘家女婿史密斯在紐約負責經營的資金即達三億)，而已故總統詹。甘迺迪的表現，尤為其主要原因。甘迺迪在職不過三年，原難評斷其為美國歷史上偉大總統，但以其年輕漂亮，有理想，有作法，他給美國帶來了一個青年進步的象徵，而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危機」中的果斷表現，終於使赤魔黑鴉雪夫低頭，俄國飛彈撤出古巴，甘迺迪遂成為美國人崇拜的偶像。當他死於非命之後，一般人(主要為甘之部屬及支持者)移愛及烏，轉而寄望羅伯。甘迺迪 (Robert Kennedy, 一九二五—一九六八)。

這就是羅伯於短短數年之內，繼在美國政壇，馳騁縱橫，甚至與詹森總統分庭抗禮，其關鍵在此。

美國援越政策，原為甘迺迪總統所奠定。在甘迺迪被刺殞命之前，駐越美軍人數已達一萬六千五百名，他會一再宣稱，如果美國在越南撤退，「那不僅是南越而且是整個東南亞的崩潰。」羅伯為乃兄重要決策人士之一，其對越立場，原極堅定，當他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訪問西貢時，尚仍大聲疾呼：「我們將在越南贏取勝利，我們將在這裡停駐，迄至我們獲得勝利為止。」(We are going to win in Vietnam. We will remain here until we do win.) 然而，會幾何時，羅伯的口吻變了，以前竭力支持南越抵抗侵略的戰爭，一年之後，卻被他斥為是最「不道德和無人性」了。

羅伯之所以變志，主要由於民間反戰運動瘋狂，再則由於大選在望，躍躍欲試，自在意料之中，而問鼎白宮，必先樹立反對詹森旗幟。前年十一月廿七日，羅伯首次發表重要反戰言論，指控詹森對越政策，他說：「現在我們進入越南，屠殺南越兒童婦女及無辜人民，因為我們不要這個戰爭在美國本土進行。」自此以後，他從沒有放過任何一個攻擊詹森政策的機會。當溪生 (Khesanh) 吃緊，詹森總統和最高軍事首長會商堅守戰略之際，羅伯就在堪薩斯大學一千五百名學生面前大聲控訴：「當美軍陸戰隊在溪生戰死而南越成千青年，却用金錢設法逃避兵役。如果南越政府認為溪生那麼重要的話，就讓他們把南越部隊調到那裡，把美軍陸戰隊撤出好了！」

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講)。其後四月中北越提出十個共黨或親共國家的首都作為進行和談地點之選擇，美國不予接受時，羅伯就指摘詹森說：「我們過去不是說過，我們除金邊華沙之外可以去任何地方嗎？」其故意刁難為敵人張目，於此可見。然而羅伯反戰言論之激烈，莫過於去年二月八日在芝加哥出版家和作家一次大會上所發表的演說，他當時不僅指出越共的全面性突襲，「終於粉碎了用以蒙蔽我們自己和實際情況的官方(美國政府當局)的幻想的假面具」，美國必須降低和談條件，承認越共共有參加南越政府之權，而對南越政府，更是極盡攻擊的能事，他說：「南越人民將不會為着充實那些將領們的私囊和富人們的銀行存款而戰鬥的，他們顯然要關門閉戶，以對付他們的政府。」他接着又說：「我們有着一個名義上的盟邦，我們支持一個無人支持的政府；如果沒有美國軍事力量的支持，那個政府將不能求得一日的生存。」(We have an ally in name only. We support a government without supporters. Without the efforts of American arms that government would not last a day.) 像這樣無情的攻擊，在兩黨所有反戰領袖言論中，尚屬首見。無怪與紐約每日新聞(Daily News)要在第二天社論中以「血腥的投資」為題，痛斥羅伯甘迺迪：「他講的愈多，愈像是那麼一個人，恐怕美國以及他們的盟邦可能就要在越南完成擊潰赤色侵略似的。」

羅伯·甘迺迪於一九四八年在哈佛大學畢業

後，入維基尼亞大學法律學院攻讀，於一九五一年獲得法學士學位。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出任國會參議院一附屬調查委員會（即委員會下之委員會）助理法律顧問，一九五七至一九六〇年升任為另一附屬之勞工活動管理委員會首席顧問；一九六一年為乃兄派任出長司法部時，年僅卅四歲，一九六四年當選為國會參議員。他的長處是精明果斷，勇於任事，而又有組織之才。他的缺點是冷酷成性，權力慾薰心，因此，他在政治方面表現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常是過於激烈、投機和無情，在美國一般人的印象中，「羅伯很像他父親的兒子，而不像他哥哥的弟弟」（He is more his father's son than his brother's brother）。他進入美國政治舞台不到十年，却成為美國近代史上一個最多物議的領袖人物，他獲得大眾的支持不小，但他樹敵最多；支持他的人為之瘋狂，反對他的人則恨之入骨，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柏柯（Russell Baker）於去年四月三日指出一次民意測驗的實例，說明美國資產階級痛恨羅伯甘迺迪的實際情形，其中有費德伯凱（Lawrence Feedback）其人，一天到晚痛罵羅伯，每次經過他太太勸止之後，轉過身來，他又自言自語：「羅伯甘迺迪，今天你又誤導了多少青年——」（R.F.K. how many kids did you mislead today?）其痛恨之深，真有不共戴天之感。

自從甘迺迪總統被刺之日起，羅伯即以問鼎白宮為職志，憑着甘家億萬家財，和他哥哥遺留下來的龐大政治資本，幾年來，羅伯即在民主黨

內積極部署組織，擴張實力，並對詹森總統進行有步驟的挑戰。他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如何爭取黑人與窮人的支持，因此他在參議院任內，常是往返於黑人窮人中心地區，探視他們的生活疾苦，攻擊政府的社會措施。由於此一努力，這位年輕的億萬富翁，竟於短短三年之內，變成了一少數民族」的發言人，黑人窮人對他嚮往的瘋狂，儼然把他當作唯一的「救星」了。

羅伯甘迺迪問鼎白宮之日程，原預定為一九七二年。但是當去年二月美國反戰運動進入無法收拾境地之後，羅伯即改變初衷相機行動，但以鑒於詹森總統仍為黨內家望所歸，故仍遲遲不敢宣佈競選。及至三月十一日，羅伯密派其重要幕僚蘇龍生（Theodore Sorensen——前為甘迺迪總統特別助理）前往白宮會見詹森，告以如總統同意設立一特別委員會主持檢討並策劃對越政策，則羅伯將不參加本屆總統競選。第二天，紐漢普夏州初選投票結果，麥卡錫得票之多，出人意料之外，羅伯認為時機已到，隨即推翻已往支持詹森競選連任之立場，宣佈重新考慮其個人之去從。三月十四日，羅伯透過國防部長克利夫（Clark Clifford）就有關設立特別委員會之建議，向詹森正式談判，羅伯並提出全部委員會名單，除將其本人列為第一名外（其意就是要自任該委員會主席），其餘多是不滿於現行對越政策之「主和派」領袖人物，並要求詹森於廿四小時內提出答復，但遭拒絕。這個駭人聽聞而被全美輿論界稱之為「甘迺迪的秘密最後通牒」，不僅是對政府制度的破壞，更是對總統權力的侵犯，

無怪乎白宮一位官員要痛斥這是「一個最惡劣的政治勒索」（the damndest piece of political blackmail）了。

當羅伯於其最後通牒遭受拒絕，隨即於三月十六日在華府國會大廈宣佈競選之後，全國譁然，咸認羅伯在紐漢普夏初選前既無勇氣出馬，一俟投票結果揭曉，即遵爾改變立場，顯示其政治之投機，達於極點。而在宣佈競選前夕，秘密提出無理要求，要挾詹森總統，更證明其手段之殘酷無情。羣憤憤慨，交相指摘，而民主黨重要人士，尤痛斥有加，全國委員會委員歐文（Frank Erwin）說：「羅伯甘迺迪的冷酷、投機和凌越過甚的野心，已說明他完全不適合擔當任何重大職位。」全美第四大都市費城（Philadelphia）的市長特梯（James Tate）說：「如果不是詹甘迺迪作過總統的話，羅伯甘迺迪可能到現在還不過是國會一個什麼委員會的顧問而已。」（If John F. Kennedy had not been President Robert Kennedy would still be counsel for some Senatorial committee.）這些指摘的言論，充分代表了一般大眾的呼聲。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當六月五日清晨三時，加州民主黨初選揭曉，羅伯甘迺迪以四十一萬三千六百六十票多數擊敗麥卡錫，在洛山磯大使旅社發表勝利演說，接受群眾歡呼後不到三分鐘時，幾聲槍響，竟結束了他的整個政治生命。今天，羅伯甘迺迪的音容消失了，他遺留給美國人民的是愛與恨，是與非，希望與失望，以及一股孜孜不息的潛在的政治力量。